

军事辩证法思想史

林伯野 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500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065-0746-3/K·67

定 价：9.30元

印記略仿于水城

晉元紀律新出

江表

甲子朝心以思起

張

五十六年

前 言

为什么要编写这本军事辩证法思想史？第一，因为这是一个空白点。介绍某个人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及其产生、发展历史的书虽然有，但很少。把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著作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按其历史发展顺序加以介绍的书，目前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还没有。既然没有，早晚总有人要来开垦这块处女地。于是，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就不揣冒昧，来作一番尝试。第二，这是统一人们对军事辩证法的不同理解的一个好办法。目前在我国搞哲学和搞军事理论的人大都承认存在着军事辩证法思想。但对于什么是军事辩证法，它包含着哪些内容，理解就不同了。有的认为它只包括军事领域的认识论、方法论；有的认为它只包括军事上的辩证法，不能包括军事上的唯物论……。我们则认为，军事领域的辩证法指的是军事领域的一般规律。这些一般规律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认识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是军事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军事领域的一般规律不止是这些，还有许多。例如战争力量建设的一般规律、战争力量使用的一般规律等等。写点文章来讨论，固然是统一认识的方法。但是如果按各自的理解，写出一些专著来则是更有说服力的。抽象地提出个想法固然好，但如果再把它具体化，描绘出军事辩证法的轮廓，使人们看得见，摸得着，便于进行比较，便于发现何种理解合理的成份更多，那就更好了。基于这种想法，我们这些合作者，于1985年撰写了一本《军事辩证法教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从横的方面提供了一个军事辩证法的理论体系；1987年，我们又撰写了一本《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新探》（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对一个突出人物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

现在，我们又推出这本《军事辩证法思想史》来，从纵的方面介绍了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相信这三本书，对人们了解究竟什么是军事辩证法，会有一些的好处。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这本书有助于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如果不了解战争的本质，不了解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文化等的内在联系，如果不了解战争力量建设的一般规律，不了解战争力量使用的一般规律，不掌握研究军事问题的正确方法，是决然搞不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对前人军事经验中的共性的东西的吸取，是培养提高我军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本书引用了古今中外许多反映军事领域一般规律的精彩的语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军事辩证法的名言集萃。精彩的军事思想在不同时代，通过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反复表达出来，足以说明它所反映的，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军事领域客观存在着的共性的规律。读了它们，会使人豁然贯通，印象深刻，为尔后的灵活运用创造了条件。

在研究军事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历史时，我们遇到几种情况：有的人既有军事实践又有军事著作，有的人虽无重大军事实践但却有军事著作，有的人则军事实践的业绩非常显著，但却没有军事著作。恺撒、屋大维、斯巴达克、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都属于后者。前面两种情况比较好办，后边这种情况就比较难办。但我们觉得他们既然打了那么多漂亮的胜仗，如果认为他们没有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就体现在他们取得了预期目的战例之中。从历史学家、传记作者的著作中，我们总可以依据确凿的史料来提炼出他们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本书的部分章节，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的。

本书是一批志同道合者协作的产物。前言和结束语：林伯野；第一章：顾明林；第二章：顾明林、王梅兴、李直；第三章：陆金声、林伯野；第四、五章：陆金声；第六章：吴其同、林伯野、谭继有；第七章：吴其同、谭继有；第八、九章：佟明

忠；第十章：王梅兴；第十一章：汪维钧；第十二章：范晓明；第十三、十四章：夏征难；第十五章：陈舟；第十六、十七章：佟明忠；第十八章：盖世金、林伯野。

古今中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涉及的地域广、时间长、人物和著作多，要全面无遗的概括一切是不可能的，只能择其要者。由于作者们知识水平有限，难免有该介绍的反而遗漏了，或虽介绍了，但概括得不够准确、不够深刻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林伯野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
第一章 孙武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
第一节 孙武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3)
第二节 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观	(7)
第三节 知彼知己的战争认识论	(10)
第四节 全胜为上的用兵思想	(15)
第五节 文武并重的治军方法	(21)
第六节 孙武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地位	(24)
第二章 先秦其他兵家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8)
第一节 吴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8)
第二节 《六韬》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6)
第三节 孙臆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45)
第四节 《司马法》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55)
第五节 《尉缭子》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66)
第三章 先秦诸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75)
第一节 老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75)
第二节 墨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80)
第三节 管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87)
第四节 商鞅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95)
第五节 荀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98)
第四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03)
第一节 秦统一中国战争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04)
第二节 《三略》和张良、韩信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10)

第三节	曹操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18)
第四节	诸葛亮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25)
第五章	隋唐时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33)
第一节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34)
第二节	李筌及《太白阴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42)
第六章	宋元时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50)
第一节	宋元时期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150)
第二节	岳飞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54)
第三节	《虎铃经》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62)
第四节	成吉思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66)
第五节	《百战奇略》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82)
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92)
第一节	朱元璋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94)
第二节	戚继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03)
第三节	《三十六计》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16)
第四节	李自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26)
第八章	古希腊时代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36)
第一节	古希腊时代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236)
第二节	希波战争时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37)
第三节	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43)
第四节	色诺芬和埃帕米农达斯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54)
第五节	亚历山大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61)
第九章	古罗马时代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68)
第一节	古罗马时代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268)

第二节	汉尼拔与西庇阿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71)
第三节	斯巴达克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76)
第四节	马略、恺撒和屋大维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	(278)
第十章	欧洲中世纪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88)
第一节	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概况	(288)
第二节	贝利萨留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92)
第三节	马基雅弗利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296)
第四节	古斯塔夫二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00)
第二编	近代资产阶级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04)
第十一章	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04)
第一节	近代俄国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历史 条件	(304)
第二节	苏沃洛夫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09)
第三节	库图佐夫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23)
第十二章	拿破仑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29)
第一节	以政治为主导的战争制胜思想	(330)
第二节	经济决定战争，战争强化经济	(336)
第三节	关于战争力量建设的辩证观点	(338)
第四节	关于战争力量运用的辩证观点	(347)
第五节	关于战争指导的辩证法思想	(353)
第十三章	若米尼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56)
第一节	在战争指导方面的辩证观点	(357)
第二节	在军事政策方面的辩证观点	(360)
第三节	在战略战术方面的辩证观点	(367)
第四节	若米尼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地位	(373)
第十四章	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376)
第一节	在战争与政治关系上的辩证观点	(377)
第二节	在战争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辩证观点 ...	(385)
第三节	在战争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关系上的	

辩证观点	(390)
第四节 在进攻与防御关系上的辩证观点	(397)
第五节 在战争与民众关系上的辩证观点	(403)
第六节 克劳塞维茨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地位	(410)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416)
第十五章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416)
第一节 恩格斯和马克思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416)
第二节 战争和军队的起源与本质	(421)
第三节 战争和军队的基础	(434)
第四节 战争力量的辩证分析	(444)
第五节 战略和战术的辩证分析	(455)
第十六章 列宁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466)
第一节 列宁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466)
第二节 辩证唯物的战争观	(468)
第三节 唯物辩证的研究战争的方法论	(474)
第四节 关于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辩证法	(494)
第十七章 斯大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506)
第一节 斯大林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506)
第二节 在战略思想方面的辩证观点	(508)
第三节 在策略思想方面的辩证观点	(515)
第四节 在无产阶级军队建设方面的辩证观点	(520)
第十八章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528)
第一节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528)
第二节 唯物辩证的战争观	(535)
第三节 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	(542)
第四节 人民战争的辩证法	(551)
第五节 人民军队建设的辩证法	(557)
第六节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568)

第一编 古代朴素的军事 辩证法思想

世界文明，在古代是多元出现，并行发展的。作为文明的重要成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生发展史。在中国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同时，古代西方也产生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本编包括中国古代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第一至七章)和西方古代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第八至十章)两大部分。中国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得很早，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西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军事专门著作《令典》、《军志》和《军政》。这些书都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虽然早已失传，但在《左传》和《孙子》中还能见到一些片断的引文。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其内容大致是记载着一些军事规律和指挥原则等。可以把它们看作中国最早的军事著作。春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军事思想随之蓬勃发展。到春秋末期，出现了驰名中外的《孙子兵法》。其作者孙武成为中国兵学家的创始人。本编中国古代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撰写即以此为起点，至明清为终点，并以军事著作作为核心而介绍的。

与中国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表现形式不同，西方古代在军事学上是军事历史著作多，军事理论著作少，大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散见于军事历史著作，尤其是体现在著名统帅的征战活动中。这就不能不给西方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带来自己的特点，也使得对西方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史的介绍不能象对中国

古代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介绍那样，以军事著作为核心，而要以战争史，尤其是著名军事统帅的实际活动为基本线索，并根据“行为体现思想”，“特殊中包含一般”的客观逻辑，用“推论还原”的方法进行提炼和概括。这是一个缺点，同时也是一个优点，历史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从历史中提炼思想可以使军事辩证法思想史与战争史结合得更紧，更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感，也更便于把握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西方古代战争史的起点和终点，按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富勒将军的说法是：起于地中海，终于大西洋及其边缘。本编按思想史的通例，从古希腊时代讲起，终止于三十年战争。严格说来，古希腊之前还有古埃及、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的建立。但许多资料已不可考，因此我们仍采用从古希腊开始的通例。三十年战争作为中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成为欧洲各国中世纪末表演的舞台，以它为终点刚好可以与西方世界的政治历史分期相吻合，它下面就是英国的内战，开始了资产阶级军事辩证法发展的新时期。这就是西方古代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史布局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一章 孙武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第一节 孙武军事辩证法思想 形成的历史条件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同时。孙武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到齐国，被齐桓公委以“工正”职务，专门管理手工业生产，同时改名为田完。田完的五世孙田书为齐大夫，因伐吕有功，齐景公把乐安封给田书，并赐姓孙氏。因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冯为齐卿，孙武就是孙冯的儿子。孙武出身于将门望族之家，从小受到了军事熏陶，青年时代就成了知识渊博的军事人才。后来，孙武因齐国政局动荡，被迫出奔吴国，并在吴国的军队里当过下级军校，只是由于作战受伤才退出了军队。孙武退出军队后，隐居到离吴国都城较远的一个山村里，过着自耕农式的田园生活。同时努力钻研军事理论，密切注视吴国的政治动向。大约在公元前512年，吴国的公子光在楚国亡臣伍子胥的帮助下取得了王位，这就是吴王阖闾。吴王当时称霸的劲敌，首推与吴国毗邻的楚国。要打败楚国，非得有知兵善谋的将帅不可。就在吴王选择将帅的关键时刻，伍子胥先后七次推荐他的好友孙武出任吴将。开始，由于吴王不了解孙武，因而总是难下决心。当伍子胥拿出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并念给吴王之后，吴王才发觉孙武确实是

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奇才，于是决定亲身召见孙武。就在这次召见中，孙武同吴王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孙武那精辟的见解，引起了吴王的共鸣，吴王连声称赞孙武的战争见解和军事才华，并当即任命孙武为大将。孙武在吴国为将期间，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公元前506年，吴王决定大举攻楚，孙武参预制定了以楚国郢都为目标实行远距离战略袭击的作战方针。这年冬天，吴王阖闾亲自出马，率领吴军主力三万余人，沿淮河西进，迅速前出到汉水，同楚军隔水对阵，然后经过柏举决战重创楚军，接着又在追击中五战五胜，顺利地占领了郢都，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十年之后，吴王阖闾在同越国的战争中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孙武又辅佐夫差，并于公元前484年发起艾陵之战，一举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之后，吴国终于取代晋国成了霸主。在连年战争中，孙武驰骋疆场，屡战屡胜，为吴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从公元前512年任吴将到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孙武在吴国有三十年的戎马生涯。

孙武所处的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社会矛盾非常复杂。首先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中，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者的奴隶，不过是奴隶主手中的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创造的财富除了极少一部分用于维持自身的生命外，其余全部归奴隶主享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其次是新兴地主与奴隶主的矛盾。封建制生产关系萌芽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取得统治地位，要想使封建制生产关系取得统治地位，代表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首先取得统治地位。但是代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奴隶主阶级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总是竭力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统治地

位，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拚死保护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反对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力量的不断增长，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并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激烈地夺权斗争。其三是侯国与侯国之间的矛盾。武王克商后，分封了许多诸侯，建立了许多侯国。侯国与侯国之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时常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西周时期，由于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权威，并以此倡导侯国之间和睦相处，反对侯国之间互相兼并，因而侯国都注意节制自己的欲望，尽量避免与别国发生争斗，侯国之间的矛盾比较缓和。到了春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周朝几经打击，王室日渐衰微，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一些力量比较强大的侯国便不以周王为介，滋长起了称霸的欲望，千方百计地兼并别国的土地，侵吞别国的财富，从而使侯国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其四是侯国与周王的矛盾。随着周王室的日益衰微，侯国对周王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周王的地位显赫，受到各个侯国的尊崇，各个侯国都要定期向周王朝进贡，不敢稍有怠慢。如今，各个侯国不仅很少向周王朝进贡，而且力量强大的侯国还常常侮慢周王，甚至向周王发起攻伐。其五是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当时，在中原地区居住着华夏民族，在边疆地区居住着各种少数民族。一些少数民族，如晋国北方的狄族，秦国西方的戎族，经常袭扰华夏民族，而华夏民族中一些力量较强的侯国也不时攻伐少数民族。因此，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总之，在春秋时期，上述种种社会矛盾都暴露了出来，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

为了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单靠政治手段已无济于事，于是围绕着诸侯争霸的问题爆发了一系列战争。最先起来争霸的是齐桓公，他任用政治家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设置常备军并严加训练，从而使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先后援助燕国打退了山戎的进攻，帮助卫国挫败了狄人

的侵犯，制服了南方强大的楚国，并消灭了三十多个诸侯国，从而取得了霸主地位。继齐桓公之后，又有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先后起来争作霸主，并为此爆发了宋楚泓之战、秦晋淆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等规模宏大的战争。到了春秋末年，处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吴国和越国逐渐强大起来，并互相争夺霸主地位。公元前494年，吴国兴兵伐越，结果大获全胜。越国被战败之后，越王勾践时刻不忘失败的耻辱，卧薪尝胆，立志报仇。经过长期努力，越国重新强大起来，并趁吴国和晋国争作盟主的机会灭了吴国。据《史记》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另据鲁史《春秋》记载，仅在春秋时期的二百多年间，就发生各种战争四八三次。由此可见当时兼并的激烈和战争的频繁。

连绵不断的战争迫使人们去重视战争、学习战争和掌握战争，于是总结战争经验，研究战争规律便成了时代的要求。当时可供总结和研究的战争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如：管仲重武事，相桓公以霸诸侯；徐偃王专讲仁义、不修战备而国亡；晋无楚备而败于邲，楚无晋备而败于鄢；楚“七遇皆北”而灭庸，栾枝曳柴伪遁而袭楚，宋襄公却因“不鼓不成列”而大败于泓水，等等。面对如此丰富的战争经验，一些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冲破了传说的战争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争模式和作战原则。如：鲁臧文仲提出了“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的观点；晋子犯提出了“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的观点；鲁曹刿提出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的观点；老子提出了“以奇用兵”、“正复为奇”（《老子·第五十章》）的观点，等等。这些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尚武言兵的结果，使春秋时期的军事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锐意创新的活跃局面。

孙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认真吸取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

军事问题所取得的成果，又深入地探讨了当时各国在战争中胜利的经验 and 失败的教训，从而写出了举世闻名的《孙子兵法》，并在其中阐发了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由此可见，孙武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当时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战争理论的总结。

第二节 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观

两军对战，必有胜负，但任何一方都想求胜而避负。为了在战争中求得胜利，就得弄清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

一、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

在孙武之前，人们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战争胜负取决于鬼神，另一种看法是战争胜负取决于人事。据说，周武王伐纣时，部队驻扎在汜水共头山，风雨交夹，雷鸣电闪，鼓毁旗折，武王驂乘惶惧欲死。周公见此情景便对武王说：“今日逆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为灾，请还师”。太公姜尚则坚决反对说：“夫用兵者，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古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贤而任能，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制，不假卜巫而事吉，不待祷祠而福从。”（《十一家注孙子》第8页）于是武王焚龟折蓍，率众先涉，结果一举灭纣。这可以说是古代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军事家和坚持迷信观点的军事家在决定战争胜负问题上的一次直接交锋。

孙武摒弃了在决定战争胜负问题上的迷信观点，继承了前人的唯物主义思想。孙武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因素却只有五个方面。一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很显然，这里所说的“道”，不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所指的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即使民众与统治者的意志相一致，

愿意为之而生，为之而死。二是天。“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里所说的天，并不是封建迷信者所说的“岁星”之类的气象，而是指昼夜、晴雨、寒暑、四季更替等天候情况。三是地。“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里所说的地，是指高丘洼地、远途近路、险要平坦、广阔狭窄、死地生地等地形条件。四是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在这里，智是要有智而能发谋，信是要诚信而能赏罚，仁是要仁慈而能附众，勇是要勇敢而能果断，严是要严格而能立威。孙武认为，只有这五者兼备的人才可以为将。五是法。“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孙子兵法·计篇》见《孙子兵法浅说》，下同，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里，“曲制”是指军中的法令制度，“官道”是指官吏的分工，“主用”是指军需物资的掌管处理。总起来说，法就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指挥信号的规定、将帅的职责、军需物资的运输管理等方面的制度。

既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以上五个方面，那么，要判断战争的胜负，就要把敌我双方在这五个方面的优劣情况进行比较，具体说来就是：一要看“主孰有道”，即看哪一方君主的政治比较开明；二要看“将孰有能”，即看哪一方将帅的指挥高明；三要看“天地孰得”，即看哪一方得到了天时地利；四要看“法令孰行”，即看哪一方的法令能够贯彻执行；五要看“兵众孰强”，即看哪一方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大；六要看“士卒孰练”，即看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七要看“赏罚孰明”，即看哪一方赏罚比较严明。在对敌我双方诸方面的优劣情况进行比较之后，就可以对战争的胜负作出可靠的判断。哪一方君主的政治开明，将帅的指挥有方，占有天时地利，认真贯彻法令，军队实力比较强大，士卒训练比较成功，奖赏惩罚比较严明，那么，这一方在战争中就能取得胜利，而另一方就会在战争中遭到失败。

二、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

在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中，孙武尤为重视属于政治